

從漢族認同角度解析《紅樓夢》

劉元富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紅樓夢》歷來被認為是曹雪芹（約 1715A.D - 約 1763 A.D）有意識之作，但創作動機無定論，本文以曹雪芹對漢族產生認同度之作為前提，試圖從民族認同的角度來解析《紅樓夢》，希望能以新面向去解讀《紅樓夢》的撰書動機。透過現有材料整合各派觀點，再帶入對書中諸多情節及符號的擺設來解構，筆者認為《紅樓夢》撰書的動機，是曹雪芹這位旗化漢人在漢族認同意識高漲後，企圖調和漢滿兩族成「命運共同體」卻失敗，最後只好透過文學執行精神層面的徹底自我放逐，寄情這種向與誰訴說的虛無心境。

關鍵詞：《紅樓夢》、林黛玉、曹雪芹、賈寶玉、漢族認同

Analysi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the Ethnicity Identity of the Han

Liu Yuan-Fu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 conscious creation by Cao Xue-qin (about 1715A.D - about 1763 A.D), but his creative motivation inconclusive. This paper assumed that Cao Xue-qin was ethnicity identify of Han with degrees as a prerequisite, trying to analysis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hoping to ge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of the motiv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xisting materials viewing all of schools of Redology, and then brought to story to deconstruct many circumstances and symbols with uses. I think that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as Cao Xue-qin, a Han person converted nationality group into Manchu ethnic group, tried to mix the Han and Manchu to become "a community status of national assimilation" because his ethnicity identify of Han with degrees rising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but he failed. Finally, he expressed his spiritual self-imposed exile and nothingness of mind by literature.

Keywords :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n Dai-yu, Cao Xue-qin, Jia Bao-yu ,

Ethnicity identity of the Han

壹、前言

《紅樓夢》前面八十回與後四十回作者是否同為曹雪芹，一直是學界爭議，周紹良（1917 A.D - 2005 A.D）在〈論紅樓夢後四十回與高鶚續書〉一文中，斷言《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全由曹雪芹所撰，高鶚（1758 A.D - 約 1815 A.D）和程偉元（？ - 約 1818 A.D）頂多只是收集各種不同殘本再進行「細加釐剔，截長補短」的編輯整理，「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它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為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為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以達到「抄成全部，復為鐫板」的目的。¹

他並就書中人物思想隨劇情前後轉折，使得人物性格從扁平化變成立體化；²以及程甲本與程乙本在章回間開端文字的銜接上，力倡《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並沒有前面八十回較佳，後四十回較差的狀況，³進而主張在思想面上，全書前後是一致的。

而筆者亦贊同此說，蓋筆者認為，若認定後四十回全部都是高鶚和程偉元續作，那永遠無法研究曹雪芹本身的創作思想，且事實上後四十回細讀起來，並無狗尾續貂之感，人物的性格遭認定丕變處，反而卻都是使該人物性格立體化之筆；許多依細節否定後四十回劇情架構，而另主張結局有其他劇情者，所提結局往往又都沒有比原有的後四十回更能呼應前八十回的劇情走向，因此筆者仍傾向後四十回劇情架構仍是曹雪芹原意，高鶚和程偉元頂多潤飾和校補，就像俞樾將石玉昆《三俠五義》潤飾成《七俠五義》那樣，頂多動到文字，劇情走向並未更動，否則將無法研究該書背後的思想，且事實上，無後四十回的劇情轉折，《紅樓夢》的面相就不可能這麼豐富。

而就《紅樓夢》全書來看，不少情節及符號都透漏出本身是旗化漢人的曹雪芹在民族認同度上，是往認同漢族的光譜靠攏，此論點余英時等人已先提出。但筆者認為，全書劇情最後選擇悲劇走向，是否代表曹雪芹的思想在自我族群認同上產生煎熬？

筆者的問題在於，倘《紅樓夢》確實是曹雪芹自我的民族意識覺醒後，對漢族產生認同度之作，則《紅樓夢》中諸多情節及符號的擺設，是否盡能朝「滿漢文化衝突下的自我矛盾影響」的方向來解釋？蓋若非在族群認同度上游離，筆者認為曹雪芹實難架構出此一多依旗人生活圈為藍圖，卻又暗藏認同漢族的意識型態衝突之作，畢竟「紅學」的研究前提在於曹雪芹是有意識地撰寫《紅樓夢》，因此本文在立論上，筆者將試圖以

¹周紹良：《紅樓夢研究論集》（山西：新華書局，1983 年），頁 80 - 81。

²周紹良舉賈寶玉投身科舉為例，指出一些學者認為此處賈寶玉因思想和前八十回大相逕庭，為續書之證的說法，是忽視人物思想本就隨劇情走向而會有轉折，他認為《中鄉魁寶玉卻塵緣》這個名目已經說得很清楚，賈寶玉把「博得一第」作為「卻塵緣」的一個步驟，是在向仕途經濟做告別的前奏。同上註，《紅樓夢研究論集》，頁 78 - 79。

³周紹良舉第九十三回末與第九十四回開頭為例，程甲本第九十三回末為「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但到第九十四回上，這個忽然想起的人並沒有下文，程乙本則把第九十三回末改成「賈芹想了一會子，並無不對的人，只得無精打彩，跟著賴大走回。」周紹良認為這是因程甲本是照曹雪芹原稿粗校，到程乙本才精校，若是高鶚和程偉元憑空續書，在行文上也不當犯此前後失聯的錯誤，甚至可照己意大改，而使之更順暢，這表示兩人確實是照殘稿整理，殘稿脫節處，兩人無法潤飾，只好就這樣敷衍了事。同上註，《紅樓夢研究論集》，頁 82 - 83。

民族認同度的角度來解析《紅樓夢》，以確認「《紅樓夢》為曹雪芹在滿漢文化衝突下的自我矛盾之作」此一假設，希望能初探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目的。

貳、曹雪芹與「排滿」思想

筆者試圖以民族認同度的角度來解析《紅樓夢》，肇因於在檢視「紅學」的研究材料時，發現無論各派別從何面向解讀《紅樓夢》，都會涉及到作者在自我族群身分上的認同，故研判應由此角度來解構《紅樓夢》，或能觸及該書背後的創作動機。

「索隱派」的紅學研究者素來不乏將《紅樓夢》視為隱喻「反清復明」之作，文本中任何指涉與「紅」、「明」、「胭脂」等符號，都往「反清復明」這意識型態上解釋，像潘重規（1908 A.D - 2003 A.D）在〈研究紅樓夢的新觀點和新材料〉一文裡就直言：

我認為《紅樓夢》作者所處的時代，是漢族受制於滿清的時代，一般經過亡國慘痛的文人，懷著反清復明的意志，在清初異族統治之下，禁網重重、文字之獄，叫人悲憤填膺，透不過氣來。作者懷抱著無限苦心，無窮熱淚，憑空構造一部言情小說，借兒女深情，寫成一部用隱語寓亡國隱痛的隱書。⁴

「索隱派」此觀點雖獨樹一幟，但整體觀來，仍不免有穿鑿附會之嫌，除完全否定掉《紅樓夢》是曹雪芹所作之外，過度以「反清復明」角度來指涉書中的隱喻，終是牽強，蓋一來諸多證據定論曹雪芹為原書作者之基調甚明；二來若照「索隱派」立論，則《紅樓夢》在價值定論上，就會像是陳忱（1615 A.D - 1670 A.D）的《水滸後傳》，但陳忱寫《水滸後傳》時猶不隱其「反清復明」，以及寄托海外鄭氏的創作主旨，其人也尚未遭文字獄之禍，則若《紅樓夢》作者倘為清初還懷有「反清復明」意識的文人，何需全書隱語到底？蓋若使讀者不解，則該書背後的涵義就無法傳達，大費周章撰寫一旁人不解之書，何益初衷？

且若其真有「反清復明」這意識型態蘊涵在文字中，高鶚和程偉元在校補時必能看出，何以敢冒險發行？且在此之前《紅樓夢》就已先流傳於市面上了，但終清代一世，此書從未興起過一次文字獄，顯然清廷並不認為此書涉及「反清復明」。

對於此類想將拔掉曹雪芹著作權的觀點，余英時（1930 A.D - ？）相當反對，他除肯定《紅樓夢》是曹雪芹之外，提出《紅樓夢》書中呈現的「反傳統」及「反封建」等意識，是曹雪芹對漢族產生民族上的認同感，他在〈關於紅樓夢的作者與思想問題〉和〈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兩篇文章裡表示，曹雪芹雖是旗化漢人，但一來因身處文字獄大興的乾隆之時，見到諸多漢族文士因文字獄遭戮；二來因家道中落，窮途潦倒，前者令他兔死狐悲，後者使他從權貴階級「飛入尋常百姓家」，「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⁵這種認同感頂多是對滿清政府有種譏刺性質的反動，於

⁴潘重規：《紅樓夢新辨》（臺北市：三民書局，1990年），頁259。

⁵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157 - 158。

自身民族情節上往漢族靠攏，尚未達訴求「反清復明」的地步。

然而，余英時所言的「曹雪芹對漢族的認同感」，其立論架設在曹雪芹因外在環境刺激，進而產生自我民族意識覺醒，但此論點有一個前提，即是曹雪芹徹底成長在充滿「滿人習俗」的生活圈，在民族認同上原本是往滿清光譜靠攏，否則就談不上後來的自我民族意識覺醒。

然因曹家世代在中國南方任職「織造」，周汝昌（1918 A.D - 2012 A.D）便依此認定曹雪芹實早浸淫於漢族文化，⁶按此推論，則曹雪芹對漢族的認同度就會是與生俱來的意識型態，絕無後期因家道中落才孕育而生的可能，周汝昌所持的觀點，顯然在時間軸上和余英時有不小的落差。

依據現有材料，實難斷言曹雪芹對漢族認同的意識型態萌芽於何階段，但無論如何，從《紅樓夢》書中諸多劇情和符號來解析，本身是旗化漢人的曹雪芹對漢族產生認同度，乃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前文已提，此認同度只停留在自我的民族意識覺醒，最多只有對傳統與封建進行反動，這點余英時已有提及，但他仍認為曹雪芹在書中許多細節裡仍對清政府有所譏刺，⁷這一點筆者持保留態度，蓋若依此，則在論點上將與「索隱派」力倡的「反清復明」主旨有所疊影。

筆者並非全盤否定「索隱派」力倡的「反清復明」主旨，只是當諸多證據都顯示《紅樓夢》劇情大致上都能做到前後呼應，以達首尾貫串之效後，就很難否定原始劇情即是由曹雪芹獨力架設的定論，而筆者依現有史實材料縱觀曹家興衰，也很難歸結出曹雪芹有產生反滿情結。

蓋曹家入滿籍甚早，且自入滿籍後，在抄家前世代長期受到清廷恩寵，還能直通帝座，相較於其他漢人大多要到太平天國後才開始佔據清政府的政壇要角，曹家的地位不能僅視為一般漢人或旗化漢人，甚至連滿人都未必能比得上。

再者，就算在雍正（1678 A.D - 1735 A.D）時遭到抄家，清廷對曹家仍是相當寬容，也不見有何重要的家庭成員受誅，甚至在曹家遷回北京時，還給予房產維持生計，曹雪芹還在旗人間自由交友，未見有哪位旗人刻意避嫌，明顯清廷打擊曹家，不過是雍正鞏固皇權的一個手段，是雍正藉掃貪之名，行立威之實的政策犧牲品，蓋曹家虧空公款甚多，剛好成雍正的箭靶。

但因曹家虧空公款主因是接駕康熙（1654 A.D - 1722 A.D）四次南巡，雍正大概也明白這個肇因，所以才點到為止，再加上曹家世代對清廷的忠誠度經得起考驗，抄家後也沒再繼續政治追殺，筆者實在找不到曹雪芹對滿清族群產生反動意識的基調，可是偏偏曹雪芹在動機上又是被有意識地在架構《紅樓夢》劇情。

「索隱派」的潘重規在釋義時，直接以否定作者是曹雪芹，來拋開作者對作品的影響，進而直接依文本進行拆解，但令筆者注意的是，潘重規此作法雖然亦淪為望文生義，但實質上仍離不開作品背後的文化面，在解構的基調上仍離不開滿漢文化是一對立面的

⁶周汝昌：〈曹雪芹和江蘇〉，徐半痴編：《曹雪芹與紅樓夢》（臺北市：里仁書局，1985年），頁532-533。

⁷同註5，《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157。

衝突。

比方《紅樓夢》第二回賈寶玉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⁸潘重規認為這是因滿清入關後，以「剃髮易服」等高壓政策暴力逼迫漢人對清民族政權進行認同，但因「男從女不從」的準則，男子得「剃髮易服」，女子卻還能保持明代服飾，遂指出《紅樓夢》此段文字意思當為：

保存故國衣冠，這是多麼尊貴，多麼清爽！剃去頭頂四周毛髮，拖著一條豚尾，這是多麼濁臭逼人！由此看來，《紅樓夢》特別推崇女子，正因為女子纔是真正的中國人；《紅樓夢》的女子至上主義，原來就是民族至上主義。⁹

換句話說，潘重規是從文化面來建構滿漢不兩立的論點，或許他本人沒察覺到，但此見解實質上已等同認定《紅樓夢》作者不是單純地支持或反對先（明）後（清）政權，而是以標誌民族符號的外在服裝造型來劃分滿漢兩族群，「逢清必反」的觀點已由政權擁戴昇華成民族對立。

筆者認為，此一昇華結果使得潘重規「反清復明」的釋義和余英時等人「譏刺清廷」的觀點達成初步的合流，剔掉「反清復明」主旨，可匯整出《紅樓夢》一書至少蘊藏「排滿」思想的結論。

但前文已提，一旦確立作者是曹雪芹，《紅樓夢》的「排滿」思想就很難站得住腳，縱觀曹雪芹生活圈，大抵和旗人相處的時間遠多於和漢人往來，敦誠、敦敏兄弟、明琳、敏誠、復齋、明義等人是滿族、張宜泉、董邦達、于景廉等人若非旗化漢人，就是長期待在滿族生活圈的漢人，曹雪芹一生都沒有遇到激進的「排滿」思想鼓吹者，就算滿族入關後漢化極嚴重，但生活習性的漢化並不代表意識型態上會產生「排滿」，而從《紅樓夢》中諸多場景是照滿人習俗走來看，例如是一大家族，沒有分家、¹⁰不重纏足，¹¹曹

⁸（清）曹雪芹：《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臺北市：廣文書局，1977 年），頁 38 - 39。

⁹同註 4，《紅樓夢新辨》，頁 266。

¹⁰余英時在〈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裡指出，蓋自宋代以來，漢人已有分家風俗，和由魏晉至隋唐的大家族生活型態已不一樣，否則范仲淹不需以義田救濟窮困同族，來緩和宗族間的階級矛盾；（清）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七「分居」曾載：「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歟？」（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亦說：「九世同居，前人以為美談……時勢殊異……同居亦有不可終合之勢；與其慕虛名而處實患，則莫如師其義而不襲其跡矣。……自私自利，天真易漓，中人而下，往往不免；則顧家庭之敦孝友，莫如擇人世之易惕而難忘者，君子以為合則不如分也。」章學誠生卒年（1738 A.D - 1801 A.D）和曹雪芹（1715 A.D - 1763 A.D）大致上重疊，且長期生活在社會基層，所言當可信。見余英時：〈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202 - 204。

¹¹清廷從入關前到入關後都多次下令禁纏足，崇德三年（1638 A.D），皇太極就下令「有效他國衣冠、束發裹足者，治重罪。」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市：中華書局，1977 年），頁 64。賈仲〈中華婦女纏足考〉亦指出：「清代屢禁纏足，順治元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進宮斬。二年詔，以後人民所生女子禁纏足。順至十七年特下制書，普下海隅，痛改積習。有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元年，又禁纏足，違者罪及父母家長。」見賈仲：〈中華婦女纏足考〉，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9 年），頁 189。顯然滿族本身並不尚纏足，執政當局甚至強力反對。但隨著滿人漢化，滿人亦染纏足之風，成為階級尊貴的象徵，生卒年相近於曹雪芹的趙翼（1722 A.D - 1814

雪芹顯然並不是激進的「排滿」分子，筆者認為若曹雪芹是激進派，按《紅樓夢》無明確朝代背景設置來看，當可在背景上盡排除滿人生活型態，只取漢族家族生活型態來安排即可，對此筆者推論，亦或曹雪芹寧可用滿人生活型態來寫漢人家庭。¹²

職是之故，筆者進一步推論曹雪芹在動機上是有意識地在《紅樓夢》裡安排漢人家庭採用滿人生活型態，「自傳派」的紅學研究者多認為此肇於曹雪芹將過去的家族興衰經驗呈現在書中之故，但筆者認為並非主因，蓋若曹雪芹只是因「飛入尋常百姓家」後憶其過往的舊時王謝，那《紅樓夢》思想從一開始就無法涉及「排滿」層面，也談不上什麼民族的認同意識，胡適（1891 A.D - 1962 A.D）認為《紅樓夢》思想高度不足，就是因他先認為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撰，隨後只就前八十回來探所曹雪芹本意之故，倘後四十回被認定是曹雪芹所撰，《紅樓夢》在思想的高度上就無法只停留於曹雪芹回首往事。

筆者認為，「自傳派」的紅學研究者的盲點在於，多將賈寶玉直接帶入為曹雪芹本人，賈寶玉的面相就是曹雪芹的面相，「紅學」研究從窄化為「曹學」研究後，又進一步被窄化成「賈寶玉學」研究，而林黛玉的原型就依書中第一回「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語，被解讀為和曹家有姻親關係的蘇州織造李煦的孫女李香玉。

對此筆者並不全盤苟同，蓋任何小說在人物的創造上，任何角色雖有可能藉由現實人物的性格來當作原有的雛型，但該角色在劇中的作用，以及本身在劇情的走向，仍不脫作者所賦予，意即角色性格在塑造上，一定程度都存在著作者本身的面相，筆者此見，肇因於認為任何人對別人形象的解讀，都是憑自己的主觀認定來進行對該人的建構，作家依現實人物杜撰虛擬角色時，也脫離不開此原則。

因此筆者認為，就算林黛玉原型確實是李煦的孫女李香玉，曹雪芹也不會全盤將李香玉的個性及思想硬置入林黛玉身上，林黛玉的角色設定，某種程度仍是在呈現曹雪芹自身的個性及思想，換言之，林黛玉本身的存在，以及在《紅樓夢》中的言行舉止，實質上是曹雪芹性格另一面的呈現。

參、以林黛玉為曹雪芹另一性格來解析《紅樓夢》

筆者之所以認為林黛玉應為曹雪芹另一面性格的呈現，是想打破「賈寶玉等於曹雪芹」的解讀模式，蓋當前人研究成果皆呈現「曹雪芹確實有漢族認同」的意識型態時，

A.D)，就在《陔餘叢考·弓足》裡指出：「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滇、黔之猺苗蠻夷亦然，蘇州城中女子以足小為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腳種田，尚不纏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顯然纏足在清代被視為一種貴族階級和基層劃清界線的文化實踐，見（清）趙翼：《陔餘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656。但反觀《紅樓夢》所書寫的上層社會裡，幾不觸及諸女角有纏足的場面，足見曹雪芹在家族場景設定上，是依滿人之習。

¹²唐德剛在〈曹雪芹底「文化衝突」〉裡認為，這是「曹雪芹這位『旗人』，動筆來寫『漢人』的歷史社會小說，碰到了內心不能解決的矛盾。」見唐德剛：《史學與紅學》（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13年），頁327-328。但筆者認為，按曹家長期在南方任官，江蘇一帶女子又以纏足為貴，曹雪芹筆下諸女角無論是不是賈府出身，幾不觸及纏足的場面，顯係曹雪芹刻意為之，曹雪芹不是「碰到了內心不能解決的矛盾」，而是在場景架構上本就有意識地用滿人生活型態來寫漢人家庭。

全盤將其對漢族認同的證據從賈寶玉身上尋找，必有矛盾之處，因此筆者大膽假設，依據「曹雪芹確實有漢族認同」的前提，再加上賈府為旗人生活型態，整部《紅樓夢》所透漏的，是旗化漢人在清代的處世狀況，《紅樓夢》全部的角色都應以旗化漢人視之，賈寶玉所代表的應是「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自身的性格」，因權貴而有旗人意識卻無自覺；林黛玉則是「曹雪芹家道業已衰敗時自身的性格」，漢族認同意識已壓過旗人意識，兩人合起來才是在撰寫《紅樓夢》時，因民族認同衝突，自我身分感到矛盾的曹雪芹，此假設筆者將試圖以下列三點來進行建構。

一、 林黛玉暗喻曹雪芹重入旗人圈子的困難

筆者會依此角度來解讀林黛玉，肇因於林黛玉這個角色登場的方式，從一開始就有次等階級的狀況，第三回中寫林黛玉的轎子要到賈府時，先是「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全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¹³「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¹⁴筆者認為這就是曹雪芹被抄家後要融入北京旗人生活圈的寫照，心態上顯得不能得其門而入。

且林黛玉入賈府，先看到「街北」，然後行走路線是由西入東，甚至進榮國府後，書中一再地寫「於是嬈嬈們引黛玉進東房門來」，¹⁵「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¹⁶筆者按，滿清由東北入關，此段文字或可釋曹雪芹在暗示自己重返外來民族主導的生活圈之命運。

筆者認為，林黛玉遇到的場景，應是曹雪芹暗喻自己在家道中衰並舉家北遷後，被迫以低姿態進入當地旗人生活圈的心境，蓋《紅樓夢》撰寫於曹家抄家後，但抄家後曹家遷回北京，曹雪芹就算漢族意識抬頭，他依舊得重新進入旗人生活圈，從他的交友圈可知，他沒有什麼熟稔的乾嘉學者，無法全面融入漢族圈子，但要進入北京的旗人生活圈，他在身分上就顯得尷尬，他無法和高位階的旗人相處，從他只能和同樣屬於政治犯後代的敦誠、敦敏兄弟來往，¹⁷便可窺見一二。

而在林黛玉初見賈寶玉時，賈寶玉換裝後以「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¹⁸的穿著打扮登場，筆者認為這身打扮一再地顯示出賈寶玉為曹雪芹塑造旗化漢人之徵。

若依符號來解構，頭頂辮子，正是滿清男性服裝標誌；以「紅絲結束」，「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然後腳穿「厚底大紅鞋」，或可釋為曹雪芹在影射賈寶玉身分本質上仍是漢族；渾身「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裝飾物，或當釋為本質為漢族的

¹³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52 - 53。

¹⁴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53。

¹⁵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63。

¹⁶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64。

¹⁷敦誠、敦敏兄弟為英親王阿濟格五世孫，阿濟格在多爾袞死後被控謀反，順治八年（1651 年）削爵並賜死，因此兩人雖屬宗室，但並不顯貴。

¹⁸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70。

賈寶玉因生活在旗人生活圈，自身漢族認同意識尚未萌芽。

前文已提，筆者認為應將賈寶玉視為「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的自身性格實體化」，則這四個裝飾物各有涵意：「項圈」暗指漢族的曹家是被滿清豢養，蓋曹家身分是「包衣」，是奴僕性質；「寶玉」則是曹家受滿清豢養後所得地位的象徵，身分不同於其他漢人，這隱喻從後面賈寶玉問林黛玉「可有玉沒有」時，林黛玉一句「我沒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兒，豈能人人皆有」便能看出端倪。

而「寄名鎖」又叫長命鎖，是掛在兒童脖子上闢邪去災的裝飾物，此代表旗人的身分幫助血緣為漢族的曹家在政治上，能擋掉許多漢人會遇到的不必要之麻煩，「寄名」一詞就帶有暫時寄放配戴者本身之隱喻，終有拆鎖並取下一天，曹雪芹用此配件，筆者認為是撰寫時漢族意識已興，象徵賈寶玉又代表過去家道尚未中落的他，在意識型態上仍寓身旗人之列，但只是暫寄。

至於「護身符」更是直接點明賈寶玉這身旗化裝扮，代表曹家的旗人身分能在清政府底下達到保護家族之效；最吸引筆者注意的則是「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諸語，這四顆大珠或當釋為曹雪芹在解釋曹家之興，起於祖上曹振彥（生卒年不詳）、曹璽（1629 A.D - 1684 A.D）、曹寅（1658 A.D - 1712 A.D）、曹頌（1689 A.D - 1715 A.D）四世，因進入後金政權而一路順遂至清代，官運四平八穩。

這樣解構文本，則此處的賈寶玉在身分上，就是從前文已提的「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自身性格」的實體化，進而反襯出林黛玉是「曹雪芹家道業已衰敗時自身的性格」，身分開始在旗人交際圈裡被邊緣化，再加上漢族認同意識抬頭，導致他重返旗人生活圈的困難。

最明顯的是薛寶釵的登場，象徵重視整體秩序性的她立刻受到賈府上下歡迎，人緣極佳，再加上還有個媽媽，以及善於經營人際關係的哥哥薛蟠（和賈府的紈袴子弟們一起為非作歹也算是一種經營人際關係的手段），更顯得孤身一人的林黛玉在賈府中具有被取代性，而林黛玉本身也明確意識到被邊緣化的狀況，但面對這種外在改變，她除了多愁善感及任性生氣，卻顯得無能為力。

也因此，筆者才會認為林黛玉在賈府中身分上被邊緣化，就是曹雪芹隱喻自己從權貴階級往下流動後，漸漸從旗人圈子中被邊緣化的心境投影，內心世界裡漢族認同意識高漲，但生活上仍得活動在旗人圈子，卻又找不到認同度，這是一種精神世界格格不入的自我矛盾。

二、林黛玉暗喻曹雪芹希望從認同找到存在感

承上述，筆者認為林黛玉在賈府地位上的被邊緣化，是曹雪芹隱喻漢族認同意識高漲的自己，無法在旗人生活圈裡找到認同，依此推論，當賈寶玉和林黛玉的互動，是從「知己」型態展開的話，那賈寶玉本身就隱含了「旗人圈子中對家道已中衰的曹雪芹（即林黛玉）伸出認同之手」的意義；林黛玉的行為舉止，則為在地位被邊緣化後，努力爭取認同，來突顯自己的存在，筆者竊以為這亦或是《紅樓夢》撰書初衷也說不定。

蓋《紅樓夢》善用「諧音法」為人物取名，甚至藏有含意，比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原應嘆息」，馮淵的「逢冤」，秦可卿的「情可輕」等等，而筆者依此方法來拆

卸林黛玉的名字，認為林黛玉之名是取材於《論語·子罕》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則林黛玉之名，取「鄰」家「待」沽之「玉」之意。

筆者之所以如此推論，蓋林黛玉是曹雪芹對漢族產生認同度之後的化身，當認同的光譜往漢族意識擺動時，存在於賈寶玉身上那原本假象的滿漢和諧就無法再維持下去，滿漢兩族群壁壘分明，本身是漢人的曹雪芹精神上遂從旗人族群中游離出來，但現實上卻仍生活在旗人生活圈，變成比鄰而居。

但這種狀況卻使得曹雪芹失去了存在感，旗人認為他是漢人，是奴才階級；漢人卻認為他是旗人，是權貴階級，¹⁹抄家後的他在旗人生活圈裡成了卡繆式的異鄉人，找不到歸屬感。

這種想尋找外在認同度的矛盾心態，曹雪芹將它加諸在林黛玉身上，建構出林黛玉細膩卻神經質的心思，使得才華極高的林黛玉無時無刻在賈府內都想透過表演欲來爭取認同，來突顯自己的存在感。

比方第十八回元妃省親，林黛玉在題詠時就想「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²⁰以及第三十八回吃螃蟹及作詠菊詩時，得第一的林黛玉在賽後聽賈寶玉又作詩，馬上說「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接著硬是要再作詩比下賈寶玉，隨後撕掉燒去等劇情可以窺探出，²¹這些情節明顯都是曹雪芹自詡為「待」沽之「玉」的自豪，以及想透過外在認同建立自身存在感的狀況。

而從第三回賈寶玉和林黛玉初見面時，賈寶玉直接問林黛玉「可有玉沒有」這一情節來看，²²「玉」就是兩人之間的聯結點，是彼此間存在認同度的符號，賈寶玉就帶有「旗人圈子中對家道已中衰的曹雪芹（即林黛玉）伸出認同之手」的意象，則他與林黛玉感情上「知己」型態的互動，以及林黛玉後來許多佔有慾發作的吃醋及使性子行為，便可依此去更深層地解釋為曹雪芹將渴望受到認同的心態寄託於斯，而非僅是表象的情愛。

但問題在於，這種狀態已昇華到精神層次，超越了漢滿的種族藩籬，可是依文獻材料來看，重新進入旗人生活圈的曹雪芹，現實上並沒有找到超越漢滿種族藩籬的「知己」，至少從文獻中筆者看不到乾嘉時期的學者有誰和曹雪芹過從甚密，自身對漢族認同意識卻又已高漲，在滿漢文化夾擊下，曹雪芹尋求認同的心態在現實上落空，只能透過檢視自身過往的歷史，試圖調和自身的滿漢認同衝突，蓋諸多涉及自傳性質的文學作品皆是由此孕育而生，因為無法在當下的生活取得精神層次的滿足，只好追憶並不如煙的往昔，再以文字把這一切上網成「命運共同體」，達到「我思故我在」的境界。

換句話說，當賈寶玉本身擁有「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的自身性格」實體化，以及

¹⁹按清初慣例，包衣任官及考科舉，比照滿人，只補滿缺；但從雍正起，包衣任官漸只能補漢人缺，至乾隆三年（1738年）起，包衣一旦要考科舉，在禮部和吏部的檔案上全列入漢軍，顯然清廷為鞏固統治，在任用人才上採取種族隔離政策，出身滿軍正白旗包衣的曹家在抄家後，或亦受歧視之列。見趙岡、陳鍾毅著：《紅樓夢研究新編》（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75年），頁7。

²⁰同註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409。

²¹同註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920-921。

²²同註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72。

「旗人圈子中對家道已中衰的曹雪芹（即林黛玉）伸出認同之手」這兩種意涵時，則筆者認為賈寶玉和林黛玉「知己」型態的互動，是曹雪芹藉由「過去的曹雪芹」來肯定「現在的曹雪芹」，這是一種調和自我內在衝突後，希望透過自覺式的認同來找到自身的存在感。

三、 結局暗喻曹雪芹最後的認同選擇

承上論，筆者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在漢族認同的意識型態高漲後，想尋求現實的外在認同度卻又不可得，只好以調和自我內在衝突的方式檢視自身歷史，藉由「過去的曹雪芹」來肯定「現在的曹雪芹」，希望透過自覺式的認同來找到自身的存在感。蓋因劇情無時無刻都在反映曹雪芹的矛盾心態，而全書最後的結局，就暗喻了曹雪芹在滿漢文化的夾擊下，最後鮮明地選擇往漢族認同立場表態。

第三回賈寶玉初見林黛玉時，因林黛玉一句「我沒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兒，豈能人人皆有」，²³遂發脾氣把一摔去，並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²⁴可見寶玉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與眾不同全繫在這塊玉上。

前文已提，「寶玉」是曹家受滿清養後所得地位的象徵，身分不同於其他漢人，但當身分地位一失之後，曹家在旗人圈子裡就失去了立足點，從後面寶玉失玉後元妃薨，寶玉漸漸癡呆劇情來看，筆者推測元妃應係指康熙皇帝，蓋康熙本名「玄燁」，「玄」與「元」，音轉也；而康熙帝駕崩於北京「暢春園」，元春之名，當取於此。失玉就等於失去了身分，顯然是曹雪芹暗喻當曹家政治靠山倒台，在家道中衰的過程裡，曹家後被迫從權貴階級游離，曹雪芹本身漢族認同意識急速滋長，寶玉失玉後的癡呆，係指精神在滿漢文化的夾擊下，曹雪芹無所適從。

在這種狀況下，象徵旗化漢人的賈寶玉被迫進行族群認同的選擇，《紅樓夢》中不只一次描寫賈寶玉得面對抉擇的狀況，例如第八回，薛寶釵取金鎖給賈寶玉看時，是「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兒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璽珞摘出來」，²⁵而當時外面在下雪，林黛玉進來時，「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²⁶象徵漢族符號的「紅」，薛林兩人各自一內一外的放置，林黛玉外披，強烈標誌著自己的立場；薛寶釵卻內斂，以「蜜合色的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線的坎肩兒」²⁷遮掩住「紅」，呼應了兩人在漢族認同上的差別。

這一幕的對比突顯出兩者意象上的差異，薛寶釵雖保有自我認同意識，但她選擇不衝撞意識型態，只有在他人詢問認同度時（即指賈寶玉求看金鎖）才稍稍表態，在一定程度上選擇為維持和諧而屈服於旗人生活圈的秩序，曹雪芹此處以「罕言寡語，人謂裝

²³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73。

²⁴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73。

²⁵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188。

²⁶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191。

²⁷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184 - 185。

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²⁸定調薛寶釵，蓋係此因之故。

也因此，薛寶釵在形象上極為符合維持滿漢民族和諧的政治需要，身為旗化漢人的賈寶玉最後在失玉並癡呆的狀態下，被迫配服從滿習秩序的薛寶釵，代表旗人圈子終究無法接受帶有漢族認同意識的林黛玉，意即撰書時的曹雪芹本身，待沽的玉終究待沽，「寶黛配」的失敗，突顯出在滿漢兩民族在意識型態上終究有調和的困難。

林黛玉之死，代表著階級向下流動的曹雪芹無法在精神上重新融入原有的旗人生活圈，而象徵「旗人圈子中對家道已中衰的曹雪芹伸出認同之手」的賈寶玉，也在不由自主的狀況下配合薛寶釵來穩定整體的秩序，賈寶玉後從癡呆恢復後，一開始並沒有全盤為林黛玉之死而自我覺醒，反而是「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²⁹顯然旗化漢人的賈寶玉一開始是將民族認同的光譜往滿族擺動，從第一百一十五回和尚還通靈玉給賈寶玉時，賈寶玉一句「噯呀！久違了！」³⁰可知，此時的賈寶玉階級雖因抄家下滑，但意識型態上卻仍未從滿族權貴游離，甚至期望回到過往時光。

筆者認為曹雪芹之所以會這樣安排劇情，肇因於他試圖調和自我內在矛盾的心態，他希望從滿漢兩族的對立面裡找到新出路，賈寶玉在林黛玉死後的行為舉止，筆者認為正是曹雪芹意圖以「命運共同體」新模式處理滿漢兩族的衝突，此點從《紅樓夢》裡京城是「長安」便可看出，一般學者多依漢代定都長安，釋為是曹雪芹心向漢族之故，但筆者認為，唐代也是定都長安，蓋唐代皇親為鮮卑血統，曹雪芹將書中京城定為長安，應是將瓦解滿漢對立面的方法，寄意於唐代胡漢共處的民族大熔爐，以達真正的「長安」。

但到第一百一十七回，賈寶玉想把通靈玉還給和尚時，遭到眾人力阻，賈寶玉這才體悟到，對眾人而言，通靈玉才是他的本體，他本身只不過是該玉的放置架，沒了象徵曹家受滿清養後所得地位的通靈玉，賈寶玉（即意識型態還停留在權貴階級的曹雪芹）就什麼也不是，賈寶玉實際上就是「假」寶玉，曹雪芹寄望的漢滿兩族「命運共同體」實質上並不存在，該玉控制了賈寶玉的自我認同，藉此呼應第三回賈寶玉自云的「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³¹

筆者認為，賈寶玉這一系列的轉變，正說明了曹雪芹的「排滿」思想並不涉及「反清復明」，只是尋求一個意識型態上的容身處，畢竟現實上滿清政府待曹家不薄，曹雪芹不可能對滿清政府痛深覺惡，所以象徵漢族認同度的林黛玉之死並沒有馬上喚醒賈寶玉對漢族的認同度，他直到意識到他自身和通靈玉之間的關係，才看清漢滿兩族「命運共同體」此模式，對漢族認同的意識才徹底抬頭，從這裡開始賈寶玉就不能再被視為「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的自身性格」實體化，而與林黛玉所代表的「曹雪芹家道業已衰敗時自身的性格」意涵已合流，也就是撰書時的曹雪芹本身，此觀點在第一百二十回結局更可印證。

第一百二十回裡，賈政恩赦復職，沒多久在渡頭遇到失蹤的賈寶玉：

²⁸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185。

²⁹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2577。

³⁰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3003。

³¹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73。

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處。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才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³²

已出家的賈寶玉在大雪天裡，以外披大紅猩猩氈的斗篷之姿向父親拜別，該幕場景及人物裝扮和第八回外面在下雪，林黛玉進來時「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一樣，是透過服裝來外顯對漢族認同的選擇。

蓋父親賈政和薛寶釵一樣，最後選擇了對旗人圈子表現出屈服的姿態，筆者認為，「似喜似悲」一語，正道出了漢族認同意識已抬頭的賈寶玉（即曹雪芹）的矛盾心理，顯然曹雪芹發現旗化漢人是因現實而仍選擇向滿清族群認同，但他重返旗人生活圈後，本身卻已無法再從潛意識對滿清族群產生認同度，寄望漢滿兩族「命運共同體」的模式又失敗，旗人終究在地位上高於血緣是漢族的他，他只好穿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代表劃清界線；而對賈政這四拜，筆者認為正是曹雪芹向滿清族群致謝，感謝滿清政府對曹振彥、曹璽、曹寅、曹頌四世以來的恩寵照顧。

《紅樓夢》隨後寫賈寶玉被一僧一道夾住，三個人飄然登岸，高吟「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蒙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而去，³³筆者認為這代表漢族意識抬頭的曹雪芹在思想受煎熬後，雖然毅然做出向漢族光譜靠攏的選擇，但現實面卻是對未來一片茫然，最後以不知向何處去的退場方式飄然而去。

筆者認為這是曹雪芹的精神面在滿漢族群對立下，為確立存在感而尋求認同，卻在自我民族認同意識覺醒後，發現無力改變「旗人認為他是漢人，漢人認為他是旗人，本身是旗化漢人的矛盾混和體」的現狀，最後透過文學寄情的方式，執行精神層面的徹底自我放逐，也使得《紅樓夢》最後以走向宗教的虛無結尾，全書所訴說的，是旗化漢人企圖調和漢滿兩族成「命運共同體」卻失敗的悲歌。

肆、結論

本文以《紅樓夢》確實是曹雪芹對漢族產生認同度之作為前提，試圖從民族認同的角度來解析《紅樓夢》，從書中諸多情節及符號的擺設來解構，以確認「《紅樓夢》為曹雪芹在滿漢文化衝突下的自我矛盾之作」這假設。

第二節裡，筆者整合「索隱派」潘重規「反清復明」之論，以及余英時「譏刺清廷」

³²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3124 - 3125。

³³同註 8，《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頁 3125。

的觀點，初步匯整出《紅樓夢》一書至少蘊藏「排滿」思想的結論，但筆者反觀曹雪芹家世，認為曹家世代累受清廷恩寵，他用滿人生活型態來寫漢人家庭，顯然不是全盤反對清廷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他對滿清族群還是有認同度。

而沿著曹雪芹家世推敲，筆者認為「自傳派」學者多將賈寶玉直接帶入為曹雪芹本人，「紅學」研究從窄化為「曹學」研究後，又進一步被窄化成「賈寶玉學」研究，忽略了林黛玉也是曹雪芹的另一面向，進而在第三節裡將撰寫《紅樓夢》時，因民族認同衝突，自我身分感到矛盾的曹雪芹在精神層面上剖成雙面，做出賈寶玉代表「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自身的性格」，因權貴而有旗人意識卻無自覺；林黛玉則是「曹雪芹家道業已衰敗時自身的性格」，漢族認同意識已壓過旗人意識的論點。

隨後筆者以林黛玉的角度開始解析《紅樓夢》，以林黛玉在賈府中地位被邊緣化，以及林黛玉頻頻想要表示出眾之念，來研判這是曹雪芹暗喻自己被抄家後重新進入旗人圈子的困難，以及希望藉由獲得外在認同，而尋求自身的存在感，並帶出賈寶玉本身擁有「曹雪芹家道尚未衰敗時的自身性格」實體化，以及「旗人圈子中對家道已中衰的曹雪芹（即林黛玉）伸出認同之手」這兩種意涵，「寶黛配」實質上有著藉由「過去的曹雪芹」來肯定「現在的曹雪芹」意味，達到「我思故我在」的境界。

由於林黛玉之死並未造成賈寶玉初步對滿清族群產生反動，筆者認為這是因曹雪芹在漢族意識抬頭後，企圖調和滿漢的族群對立，上網到「命運共同體」，但賈寶玉直到領悟到通靈玉和自己的關係後，才開始看破紅塵，這代表這樣的理想終告失敗，從這裡開始賈寶玉所代表的，就是撰書時的曹雪芹本身心境。

最後筆者以《紅樓夢》結局賈寶玉在大雪天裡披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準備重返政壇的父親賈政拜別，呼應前面林黛玉在下雪時「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的穿著，從服裝標誌代表曹雪芹最終決定和滿族劃清界線，但以拜別之姿感謝清廷的照顧，最後以不知向何處去的退場方式飄然而去，筆者認為這是曹雪芹發現無力改變「旗人認為他是漢人，漢人認為他是旗人，本身是旗化漢人的矛盾混和體」的現狀，最後決定執行精神層面的徹底自我放逐，進而研判《紅樓夢》撰書動機，是曹雪芹這位旗化漢人在漢族認同意識高漲後，企圖調和漢滿兩族成「命運共同體」卻失敗，最後只好透過文學，寄情這種向與誰訴說的虛無心境。

伍、參考文獻

- 余英時 (2002)。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市。
- 周紹良 (1983)。紅樓夢研究論集。新華書局，山西省。
- 徐半痴編 (1985)。曹雪芹與紅樓夢。里仁書局，臺北市。
- 唐德剛 (2013)。史學與紅學。遠流出版社，臺北市。
- 曹雪芹 (1977)。程乙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廣文書局，臺北市。
- 趙爾巽等撰 (1977)。清史稿。中華書局，北京市。
- 趙翼 (1957)。陔餘叢考。商務印書館，上海市。
- 趙岡、陳鍾毅著 (1975)。紅樓夢研究新編。聯經出版社，臺北市。
- 潘重規 (1990)。紅樓夢新辨。三民書局，臺北市。
- 鮑家麟編 (1999)。中國婦女史論集。稻鄉出版社，臺北縣。